

# 德性的公正与规范的公正及其关系

高恒天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作为古希腊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意识到了公正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德性的公正与规范的公正。这两种形式的公正之间存在着典型的辩证关系,它们互为前提,互有长短,相互生成并塑造着对方,正是在这一不断地相互转化过程中实现着德性的公正与规范的公正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而作为规范的公正与德性的公正的统一体的公正则是在这样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过程中得以发展变化。

**关键词:**德性的公正;规范的公正;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29(2005)05-0029-04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两位最早研究过正义的西方思想家。二人都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而且是一种社会原则或规范,从而为人们指出了正义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这对于今天人类要建立公正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柏拉图断定,人的灵魂都由理性、意志和情感三部分组成。理性的美德为智慧,意志的美德为勇敢,情感的美德为节制。在这三种美德中,智慧指普遍的、统筹全局的知识,即关于理念的知识。勇敢指坚决服从和执行理性的教导,坚持正当合理的事情,节制则是对于情感欲望的克制。公正则是理性、意志和情感三者之间的一种应然关系,即理性居于支配地位,它给灵魂的其他两部分发号施令,指挥灵魂的其他部分。意志则为理性而行动,协助理性而控制情欲,而情感则应服从理性的支配。根据柏拉图的这种分析可以看出,与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相比,公正是作为整体的灵魂或人格的美德,而其他三种德性则仅仅是组成灵魂或人格的部分所具有的美德。这里已经显示出了公正作为美德的总体的意义。

公正也是一种社会原则,因为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国家是由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部分构成,统治者是由少数受过哲学训练,具有“智慧”美德的人,其职能是治理国家,指挥他人;武士是处于社会的第二等级,具有勇敢美德的人,其职能是防御敌人,保卫国家;劳动者是处于社会的第三等级,以节制为美德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其职能是生产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这三个等级的人各守本位,各司其职,和谐一致,才能实现社会的正义或公正。从这个意义上看,正义实

际上就存在于社会有机体的这三个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中,也就是“每个人应当做一件适合他的本性的事情”<sup>[1](P115)</sup>,“做自己事情而不干预别人的事情”<sup>[1](P116)</sup>。这一意义上的正义是一种社会公正,是社会上不同等级与职业的人相互交往的原则或规范,所以这一意义上的公正或正义实际上是最早的规范意义上的公正。这两种形式的公正或正义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和追求过程之中,统一于人们的正义行为之中。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五卷中,亚里士多德较集中地论述了关于公正的思想,“所谓公正,是一种所有人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使他们成为作公正事情的人,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sup>[2](P95)</sup>。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不但把公正理解为一种德性,而且更进一步理解为最重要的德性,他说:“公正自身是一种完满的德性,它不是笼统一般,而是相关他人的。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光辉,正如谚语所说: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sup>[2](P97)</sup>“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sup>[2](P97)</sup>。在肯定公正作为一种德性而存在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另一种意义的公正,即“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订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以及“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了比例”<sup>[2](P101)</sup>,“公正还是一个公正行为公正选择中所遵循的原则”<sup>[2](P107)</sup>,等等。从这些关于公正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其实也意识到了公正的另一类存在形式,即以公正的规范的形式存在着的公正,这种公正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收稿日期:2005-04-28

作者简介:高恒天(1963-),男,陕西兴平人,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了公正问题的实质,他说道:“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在这方面,这种世俗之见恰好和我们在伦理学上作哲学研究时所得的结论相同。简而言之,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可是,这里引起这样的问题,所谓‘相等’和‘不相等’,它们所等和所不等者究为何物?”<sup>[3](P148-149)]</sup>

根据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实质问题的这一揭示,可以看出,人类一切关于公正的分歧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可是,这里引起这样的问题,所谓‘相等’和‘不相等’,它们所等和所不等者究为何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柏拉图的公正观可以看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的特殊情形,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根据什么来如何分配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柏拉图实际上主张按照人们所属的阶级与职业来分配权利与义务。虽然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正的理解与柏拉图对公正的理解存在着基础的不同,即柏拉图的正义是以社会不平等或等级为出发点和依归的,而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从平等的角度来理解正义或公正的。但从社会公正的存在视域看,他们都认为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公正,或者说,公正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为规范的公正,一为德性的公正。

根据两位最有影响的古希腊思想家对公正的这一共同理解,可以使人领悟出:所谓德性的公正,实际上是公正占有了人的人格,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意志、认知、情感等方面展现为以公正为指南的定势:即从意志方面看具有公正的意向性;从认知方面看,具有关于公正与非公正的理性辨析能力;从情感方面看,具有对公正的情感认同。正是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结构整体。它们都表现为一种以公正为追求趋向,以公正为其内容的特点。这种包含着公正定势的精神结构或人格结构正是公正实践的靈魂,是公正的心灵。需要说明的是,不存在超历史、超社会、超现实的公正心灵,公正的心灵或灵魂总是与具体的个人、具体的社会、具体的历史相联系,它本身就是这三者在一定的环境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将永远处于一个生成、发展的过程之中,并因此而具有现实的历史性。

所谓规范的公正或公正的规范指的是表达公正的价值观念、公正的理想、公正的准则或原则或规范,它们解决的是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标明“所谓‘相等’和‘不相等’,它们所等和所不等者究为何物”的问题。人们正是根据公正的规范或规范的公正来认知、判断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并因此而形成社会公正的舆论,通过这种舆论使公正的规范或规范的公正成为公正的一种存在方面。它与德性的公正共同构成了人类公正实践的存在之域。

作为公正存在的两种形式,德性的公正与规范的公正之间有着典型的辩证关系,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首先,德性的公正向规范的公正转化。在德性的公正向规范的公正转化的过程中,人格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正是德性的公正首先与人格水乳交融并因此而获得了能动性,才使德性的公正获得了向规范的公正转化的现实途径。在现实生活中,规范的公正往往可以通过对榜样的超越或辩证否定而涌现出来。规范的公正之所以能成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关于公正的准则或规范,就是因为规范的公正能够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需要,特别是能够反映统治者的需要或社会强势集团的需要,能够体现相应时代的特别是统治者所要求的社会公正理想。这种公正理想并不是出于人们随意的想象,而是以现实的社会存在和现实的利益格局为根据,同时又在这些榜样中取得了具体形态。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规范的公正具有抽象性,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认识论范畴,而公正的榜样却是具体的、亲切的、易感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本体论范畴。这种区别使得人们对于公正的榜样的把握具有优先性。或者说,人们总是先对公正的榜样有所领悟,这种被领悟的公正的榜样一旦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人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公正的榜样为榜样来调整自身的行为,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见贤思齐”,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已经说明公正的榜样具有一种与规范的公正相似的功能——人类行为导向的功能;而且由于公正的榜样集德性的公正于一身,人们如果长期以公正的榜样为榜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得了与榜样相似的德性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看,向公正的榜样学习其实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培养德性的公正并使人们遵守规范的公正的重要方式。这在本质上不但是德性的公正以榜样为中介的一种自我繁殖或克隆过程,而且也同时使人们在不知道规范的公正为何物的情况下遵守了社会所要求的规范的公正。

利用人们向公正的榜样学习的机制来养成人们德性的公正并使人们遵守社会所要求的规范的公正,中国人早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sup>[4](P152)]</sup>以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sup>[4](P154)]</sup>从季康子与孔子的这两次对话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孔子已经主张使统治者本人成为公正的榜样,并通过人们向这种公正的榜样学习以构建一个人们普遍遵守公正的规范并养成人们德性的公正的德治社会。

公正的榜样中包含的德性的公正,在人类认识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标准意义的公正的规范。因为公正的榜样中包含着的德性的公正的相似性很容易使人们通过自己的概括能力、抽象能力而使这种德性的公正与具体的榜样相分离,使这种德性的公正成为在

思想上相对独立的与具体的榜样相分离的具有标准意义的公正的规范。这种具有标准意义的公正的规范因其外在于人的人格而具有最早的规范的公正意义。换句话说,人们通过一定的抽象而使德性的公正与一定的榜样相分离,从而形成了对一般社会成员具有定向与指导功能的规范的公正。

这种规范的公正是以观念的形态存在的,它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以及人格的外在性。这种具有概括性、抽象性以及人格外在性的规范的公正,虽然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是以榜样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它一旦产生出来,就自有其优势。这种优势的具体表现在于,规范的公正以其抽象性、概括性、标准性,而同时也就具有了普遍性和非人格性。这使得规范的公正因此可以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指导社会成员行为的功能。与此相比,公正的榜样因为其产生的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因为其与实际存在的人格的联系,使之本身具有难以在更大范围内直接推广的局限性,再加上实际存在着的榜样一般并没有人们所宣扬的公正的榜样那样完美,一旦人们知道了所宣扬的榜样与实际榜样之间的这一差距,就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就使得通过向公正的榜样的学习来养成其他社会成员的公正的德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大打折扣甚至前功尽弃。而规范的公正,以其概括性、抽象性、标准性和非人格化的特点,恰恰可以彻底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另外,公正的榜样由于其是一种人格,而这种人格又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之中,所以要把这样的人格在社会之中进行推广或使人们以之为榜样,就存在着一种难以普遍化的困难,人们或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绪或地域偏见而抵制向这样的公正的榜样学习,或出于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而认为自己不能或无能力向这样的公正的榜样学习,或出于宗教原因而放弃向这样的公正的榜样接近,但所有这些不利的情况都可以以非人格化的规范的公正来避免。这正是规范的公正的优势之所在,正显示了规范的公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势。规范的公正以其非人格化、可普遍化而对一切社会成员一视同仁这种优势也正是它超越公正的榜样获得其在社会中的独立存在地位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德性的公正,通过榜样以及人们的抽象概括能力,向规范的公正转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规范的公正向德性的公正的转化。规范的公正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通过塑造公正的榜样来实现其向德性的公正转化或过渡。需要说明的是,从德性的公正通过人格以及人类的认识能力,而向规范的公正转化的过程来看,必然要承认德性的公正相对于规范的公正的存在具有优先性,但从公正的规范向德性的公正转化的角度来看,则逻辑地存在着相反的情形。因为从德性的公正依附于人的本体而存在的角度来看,德性的公正通过人格确实存在着相对于规范的公正存在的先在性,但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来看,德性的公正并非时时处处先在于规范的公正而存在。在这里,德性的公正与规范的公正究竟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其实是一

个抽象的、脱离历史实际的问题,这就像鸡与鸡蛋何者在先,何者在后这样的问题一样。历史与科学表明,作为公正系统的最基本构成方面,规范的公正与德性的公正都是公正系统进化与发展的产物,社会发展的每一时期都存在着与该时期相适应的规范的公正与德性的公正,它们共同构成了相应时代的公正风貌。

人类社会之中公正的榜样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并不是出于杰出人物的纯粹的自愿自觉性或先知先觉性,杰出人物或公正的榜样身上所体现的德性的公正的产生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而规范的公正则是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榜样或杰出人物所产生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保证这样的榜样产生的价值原则以及这种价值原则赖以存在的社会风尚。事实上,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所理解的价值原则以及与该价值原则一致的规范的公正,确认或突出榜样所具有的德性公正。公正的榜样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凌驾于一般人格之上,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所学习的榜样,就是因为榜样符合当时或后世的价值取向以及相应的规范的公正、风尚与习惯。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上的公正的榜样总是与一定形态的规范的公正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一定的规范的公正成就了一定的公正的榜样。具有平等、自由德性的公正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在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种榜样,因为这样的榜样与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规范的公正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看,正是具有一定的价值观念与规范的公正,才会产生相应的公正的榜样以及这样的榜样所具有的德性的公正。

从规范的公正向公正的榜样的转化以及实践的角度来看,规范的公正的内化或转化为人的德性的公正,是通过环境的影响、教育的引导、个人理性的认同、情感的体验、自愿的接受等环节来达成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环节,外在的规范的公正逐渐地融合于个体内在的公正意识之中,并通过人的公正实践而凝结为人的德性的公正,统一于人的人格,或者说使德性的公正占有了人格,并通过这种占有而成为人格的构成部分。而且这种转化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是因为榜样与规范的公正相比,又有着规范的公正不可替代的社会优势,因为如果不将规范的公正转化为凝聚着德性的公正的人格,就难以产生社会所需要的公正行为。榜样以其具体性、崇高性和亲切性以及与普通大众的同质性对于鼓舞、激励人类的德性的公正的养成,对于更多的榜样的出现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孟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孟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的榜样之一,就与那些比孟子更早的榜样的鼓舞、激励分不开,孟子关于“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sup>[5](P135)</sup>的自白,清楚地表达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亚圣”的心路历程。据说朱熹十岁时看到《孟子》上面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语,就注定了他要走成圣成贤的

榜样之路。

除了以榜样为中介而使规范的公正向德性的公正转化这样一种机制外,规范的公正还可以通过人们的公正评价而实现其向德性的公正的转化。在这样的规范的公正向德性的公正的转化机制中,公正评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公正评价指的是人们应用已掌握的规范的公正,对自己或别人的行为的是非、善恶等进行评价。通过这样的公正评价,人们就会把自己或别人的行为与规范的公正相对照;而通过这样的对照,人们就会提高自身或别人的公正感悟能力;在这种反复的公正评价过程中,行为就能不断地加深对规范的公正及其意义的理解,增强自己的公正体验和支配行为的力量,从而使规范的公正对行为的要求逐渐转化为德性的公正对人的行为的自觉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就相应地实现了规范的公正向德性的公正的转化。

总之,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看,德性的公正与规范的公

正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前提,互有长短,相互生成与塑造对方的一种转化关系,正是在这一不断地转化过程中实现着德性的公正与规范的公正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而作为规范的公正与德性的公正的统一体的公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过程中得以发展变化。

####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 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3]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4] 孔子.论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5] 孟子.孟子[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 Justice of Virtue and Justice of Norm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GAO Heng-tian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Philosoph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s the outstanding thinkers of ancient Greece, both Plato and Aristotle realized that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basic justice, namely justice of virtue and justice of norm. There are typical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justice, which interdepend, transform, and complement, raise each other and mould the opposite side. It is in this very process that the two kinds of justice are united historically and concretely. And also, justice, as a whole of the two kinds of justice, develops and changes in that very process.

**Key words:** justice of virtue; justice of norm;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责任编辑:李 彬)

(上接第 21 页)

- [4] 李俐、徐卫翔.康德的先验统觉[J].复旦学报,1996,(6):69-73.
- [5] 王向清.冯契对休谟问题的解答[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5):43-49.

## Apprehension: the Important Category of Epistemology of Feng Qi

WANG Xiang-qing, CUI Zhi-zhong

(Research Centre of Mao Zedong Though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Feng Qi is the first philosopher who brings apprehension into the category of epistemolog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He limits the meaning, inspects the source, clarifies the function and inquire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rehension.

**Key words:** Feng Qi; apprehension; epistemology; category

(责任编辑:李 彬)